

東方道德人文主義之研究

吳光著

儒家哲學片論

允晨叢刊

30

儒家哲學片論

吳光著

——東方道德人文主義之研究

允晨叢刊30

儒家哲學片論

作　　者：吳　光

發行人：林伯峰

執行編輯：潘雪玲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服務電話：507-2606~7

傳真電話：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　　製：龍岡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170元

ISBN 957-9027-09-9

自序

當代中國著名的哲學史家兼「新儒家」馮友蘭先生說過：歷史有「本來的歷史和寫的歷史」之分。本來的歷史是客觀存在，寫的歷史是主觀的認識，主觀的認識總不能和其所認識的客觀對象完全符合，寫的歷史同本來的歷史也不能完全符合。所以，寫的歷史永遠要重寫，歷史家也永遠有工作可作①。另一位著名哲學家兼美學家李澤厚先生則說過：「真正追求歷史的真實，就應該把它同追求對歷史了解的真實結合起來。真正的歷史真實就存在於對歷史了解的真實中間，存在於對歷史的解釋、對歷史的理解中間，而對歷史的理解也正是對自己存在的理解。每個時代都不斷地寫歷史，都是根據自己此時此刻存在的要求來回顧歷史，使歷史成為推動我們前進的背景和動力，絕不是簡單的知識和記錄而已。」②兩位學者的用語雖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這是他們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和理論創造工作的經驗總結。

我不是哲學家——因為拿不出自己創造的、與衆不同的理論體系，也不是歷史學家——因為自己並沒有一套獨特的解釋整個人類歷史的理論和方法。但我自認為是個對哲學和歷史都有興趣愛好的學者——學別人創立的哲學，學別人寫的歷史，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選擇自己所能接受的

理論，形成自己對歷史真實的理解，從而用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去追求歷史的真實，並且自己也學着寫歷史，包括思想史。我寫的第一本思想史著作《黃老之學通論》（一九八五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便是以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追求歷史真實的結果——儘管離「本來的歷史」可能差之甚遠，但那是我當時的一得之見，因此從不追悔。

對於儒家哲學，我是從接受反儒學的思潮開始的。我在中學時代，就很喜歡歷史、哲學和文學。讀了不少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尤其對《狂人日記》、《阿Q正傳》和《孔乙己》印象很深；又在《中國歷史》、《社會發展史》一類教科書之外，讀完了一位村秀才送給我的王充的《論衡》，還通讀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兩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和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在大學時代，則選讀了馬、恩、列、毛的幾部哲學原著和《聯共（布）黨史》、《世界通史》、《中國史稿》一類哲學、歷史著作。在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那時我在工廠工作，為了參加「評法批儒」而讀了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簡編》和楊榮國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並且站在批儒的立場上讀完了《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和《論衡》等書。於是在我的思想上，一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一面形成了「孔子和儒家代表中國保守、反動的封建主義傳統」的認識。這便是我過去不能客觀地評價儒家和儒學的思想根源。

但在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個喜歡隨大流，趕時髦的人，有時也頗想獨立地思考一些中國的

歷史和政治問題。所以我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寫了一篇題爲《戚本禹的垮台說明了什麼》——論極左機會主義的破產》的長篇大字報以後，一直在思想上堅持批判我視之爲「極左機會主義」、「左傾教條主義」的東西。自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以後，我自選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方向，這才真正系統地讀了一些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原著，並開始在力所能及的研究領域裏清算別人的和自己的各種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觀點。一九七九年，我寫了篇重評董仲舒思想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辨》的論文③，肯定了董仲舒作爲漢代新儒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積極歷史作用。一九八〇年九月，又在由《中國哲學》編輯部和《光明日報》理論部合辦的「青年哲學史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個批評「哲學的黨性」和「哲學的階級性」等教條主義觀點的發言。其中否定列寧「哲學的黨性」觀點的文章公開發表以後④，即被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布羅夫點名批評爲「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⑤，又被國內某些人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評爲「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黨性原則」，是哲學界「精神污染」的表現之一⑥，諸如此類的批評，雖然在周圍同行的竊竊私語中給我造成某種心理壓力，但並沒有能迫使我自己觀點。

但我真正對儒學作系統的思考和研究，還只是近兩三年的事，特別是應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之聘於去年五月來此擔任專職研究員以後，才得以放下其他的工作而集中精力研究儒學這一課題。我的研究課題原定題目是《儒學——一種開放型的人文哲學》，是在一九八六年春由於劉述先、

陳俊民教授的推薦而向東亞哲學研究所提出研究申請時擬定的，當時只作了初步的設想，並且只打算寫一篇較長的論文，而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另外一個研究課題上面。來所以後，所長吳德耀教授希望我將研究重點放在儒學課題上，才促使我下決心對儒學作一系統的研究，同時也對自己以及某些國內外學者以往對儒學存在的種種見解作出自己的評判和清算。儘管由於時間的短促和理論水平的局限，我的研究還是很粗糙、很膚淺的，但略可自慰的是，我總算寫出了這麼一本小書，可以獻給爲我提供了優越研究條件的東亞哲學研究所，以及對儒學有興趣的讀者們。我之所以將書題定名爲《儒家哲學片論——東方道德人文主義之研究》，一則是實事求是地表明我對儒學僅只有初步的片面的了解，二則想突出我對儒家人文主義哲學的道德主體性特點的認識。因爲在過去，有不少新儒家或反儒家學者把儒學概括爲「倫理本位主義」或「泛道德主義」，我覺得這樣的概括並不確切。因爲儒學雖然重視人倫關係，但最根本的特點是確立了普遍內在的人類道德的主體性，而不是外在的人倫關係的主體性；這種確立道德主體性的哲學又十分重視社會問題的解決和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肯定，是富有人本主義或云人文主義精神的，因而不能視之爲「一切皆道德」的「泛道德主義」。因此，我把這種確立道德主體性的人文主義哲學稱之爲「道德人文主義」哲學。而儒學這種道德人文主義哲學與宗教觀念籠罩下的西方道德哲學又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我又把它叫作「東方的道德人文主義」。當然，我們毋需在名詞概念上大作文章，每個人都有權採用自己所能

理解的名詞概念去表述自己對某種哲學形態的理解，至於理解得準確與否，則只有聽諸公論了。

在此，我懷着誠摯的心情，謹對支持本課題研究的東亞哲學研究所董事會以及所長吳德耀教授表示衷心感謝，並對該所圖書館、行政部諸位女士、先生的多方協助一併鳴謝。全稿是由內助張玉蓮女士謄抄的，她還體貼入微地照顧了我的異國生活，特誌於此。

本書承蒙允晨文化公司楊志民經理、黃進興博士的大力支持，使之得以在台灣正式出版，君子高誼，誠信可銘！

嗚呼，人生幾何？惟德長存！倘若這本小書，能為儒學的生存發展貢獻一知半解，則也算不曾辜負了獅城人民的一載養育之恩。否則，其罪多多矣！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浙江吳光 記於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

注：

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頁一~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版。

②李澤厚：〈中國思想史雜談〉，載《復旦學報》（社科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③該文原由《中國哲學》主編決定發表於該刊第七輯，後因某種原因拖延未發，遂以〈論董仲舒的政治學說及其進步歷史作用〉為題發表於《浙江學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④吳光：〈談「哲學的黨性」〉，載《光明日報》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第三版；唐光（唐合儉、

吳光的合作筆名）：《「哲學的黨性」一說之弊》，載《中國社會科學未定稿》一九八五年第九期，至於反對「哲學的階級性」觀點的文章，原已決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學習與思考》雜誌發表，但在我的研究生導師的再三勸阻下而撤回未發。

⑤V. G. BUROV：〈十字路口的中國哲學〉，載蘇聯《哲學問題》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⑥周立升：〈再談環淵——答吳光同志〉，載《齊魯學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本刊評論員：〈清除理論戰線的精神污染〉，載《理論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目錄

自序

一

第一章 儒學的產生與孔孟荀哲學

第一節 殷周的「天命」觀與孝禮觀念 四

第二節 孔子的仁學 一七

第三節 孟子的性善論與仁政說 二三

第四節 荀子的性惡論與隆禮說 三二

第二章 儒學的演變（上）——漢唐經學

第一節 儒學演變的基本態勢 四七

第二節 董仲舒與兩漢經學 五七

第三節 衰落時期的變革——魏晉隋唐的儒學 六九

第三章 儒學的演變（下）——從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學

第一節 宋明理學的崛起與演變 七九

第二節 衰落僵化與改革轉化的雙重變奏

——清代實學與現代新儒學 一一六

第四章 儒家哲學的基本特點

第一節 當代學者的不同認識 一六八

第二節 以人生為對象道德為本位——道德主體性特徵 一七四

第三節 「內聖外王」與「經世致用」——「實用理性」特徵 一七九

第四節 「天人合一」與「知行合一」——整體一元論的思維特徵 一八四

第五節 生生不息與日新精神——開放性特徵 一八八

第五章 儒學發展前景一瞥

第一節 現代化社會對道德人文哲學的呼喚 一二〇

第六章 儒學與知識分子的傳統性格

第二節 儒學面臨的挑戰及其轉化的必要性 ······	二〇四
第三節 儒學「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及其現代角色 ······	二〇八

- | | |
|--------------------------------|-----|
| 第一節 儒學對知識分子政治意識和政治性格的培養 ······ | 二一九 |
| 第二節 儒學強調知識分子的道德修養與人格完善 ······ | 二三一 |
| 第三節 儒學影響知識分子性格的利弊分析 ······ | 二四〇 |

附錄

儒學研究的新契機

- | | |
|------------------------|-----|
| ——新加坡國際儒學研討會述要 ······ | 二四九 |
| 民族傳統與文明出路的誤導性反省 ······ | 二六三 |
| ——對《河殤》的批評性反思 ······ | 二六三 |

第一章

儒學的產生與孔孟荀哲學

儒家，或曰儒家學說、儒家哲學、儒家思想，名雖不同，其實則一。古人雖有以儒學爲「儒教」者，但那是「教化」、「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唐宋以後所謂「儒、釋、道三教」，其中「儒教」雖然帶有宗教意味，但主要還是指學統和學術，而非宗教。至近代中西文化發生交流，遂有不少人用西方宗教的觀念和標準去解釋儒家學說，把儒學說成是「儒教」，甚至把中國文化傳統、政治傳統片面地理解爲所謂「儒教中國」。這些「儒教」，論者大體可分四類：一類是純西方傳統的學者或宗教人士，他們站在西方基督教傳統的角度觀察東方中國的儒學傳統，而把儒學視之爲東方人的宗教。另一類是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東方國家學者或民衆（如日本、南韓及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華人），把對儒家的信仰奉之爲有別於佛教、基督教、回教信仰的宗教信仰，故稱之爲「儒教」或「孔教」。再一類是對一切宗教持批判立場，視「宗教爲鴉片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如中國著名哲學史家任繼愈），把漢代以後特別是唐宋以後的儒學「正宗」（或官方儒學）視之爲「儒教」而加以批判。還有一類是某些「當代新儒家」學者（如牟宗三、唐君毅）有時爲了表達儒學的「超越性」意義，或試圖說明儒學也可與西方基督教「媲美」而把儒學稱之爲「儒教」。對於這種種「儒教」論的是非曲直，本書不打算加以具體分疏，也不想採取任何一種「儒教」論的解釋，而是把儒學當作一種東方人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和研究。

儘管已有不少學術專著對儒學的起源、演變、特點、前景諸問題作出了系統的探討，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其實正體現了每個人對歷史真實的理解、解釋各不相同罷了。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人們可以從「殊途百慮」之學中見其「同歸一致」之旨。然而，生在當今多元社會，多元文化競爭並存的世界，我們毋寧多講點「殊途百慮」之異，而少說點「同歸一致」之同，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大概也是學術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吧。因此，筆者將本著自「對「歷史真實」的膚淺理解，從儒學的起源談起，然後推而廣之，探討其演變的歷史、理論的特點、發展的前景諸問題。」

第一節 殷周的「天命」觀與孝、禮觀念

哲學發生學的知識告訴我們：一切哲學，都起源於人們對自然、人生及人與自然關係的理性思考，這種理性思考又無不受當時當地的人類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在上古社會中，人類生產力水平極低，物質生活條件也極惡劣，所以，人類對人與自然的觀察和思考都不免充滿著對超人力的自然力量的恐懼和崇拜，這是產生宗教意識的客觀根源。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人類對於自身能力的認識日益豐富，自信心不斷增強，理性思維的水平也不斷提高，從而日益減少對自然力的盲目崇拜，並從自身的經驗中提煉出一套認識世界的方法和理

論。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是在逐步擺脫盲目崇拜自然力的原始宗教意識的過程中誕生的。

然而，人類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不同的區域，所處自然環境不同，賴以生活的自然資源及取得生活資料的條件和手段不同，從而也構成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關係。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區的族群所具有的宗教意識和哲學觀念也就會有不同。況且，每個哲學家個人的天賦氣質、生活經歷和所受文化教育的情況各不相同，自然就形成了各具特點的哲學理論了。這或許是西方哲學何以從一開始就形成不同模式和特點的一個基本原因吧！

例如古希臘人，他們生活在城邦國家，商業和貿易比較發達。貴族生活悠閒自在，貴族知識分子能在比較自由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理性思辨和文化創造工作。古希臘的哲人儘管也不時受到社會人生問題的困擾，但他們不像中國先哲那樣時時有一種解答社會人生問題的迫切感和憂患感，因而比較能注重於對宇宙與自然的純理性思辨，注重於知識的求真。城邦國家的建設促成了幾何學的發展，幾何學的成就又為哲學家提供了思維的依據和方法。所以，古希臘哲學家得以創立獨特的邏輯學、辯證法和原子論哲學是不足為怪的。羅素在其著名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說過，希臘人的上帝是一個建築師而非造物主，而猶太人的上帝卻是全能的造物主。柏拉圖心目中的神是幾何學家，後代各種宇宙論則大多淵源於古希臘的自然哲學。我認為羅素這些說法是很精闢的。西方哲學之重思辨、重科學、重知識的傳統特色，大體上是從古希臘哲學繼承和發揚起來的。